

魏钦公，1921—2000年，山东单县人。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首任中共单县城关区委书记，历任湖西区党委《团结日报》社总编、单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先后任华山、华砭、光罗县、光山县委副书记、县支队政委。1950年，调至河南省委党校工作，历任教育科长、教导主任、党委书记、校长等职，兼任河南省党史委副主任、社科联副主席、哲学学会会长，被选为河南省委第三届候补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主编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领导科学纲要》等。



魏钦公

孙子眼中的『抠门』爷爷

河南省光山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魏钦公

翻开《魏钦公回忆录——湖西抗争和坚持大别山斗争》，扉页上是一位老人倚船栏而立的照片，一套深蓝色中山装让他显得格外精神。他凝视远方，笑容温和。

魏钦公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光山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遗憾的是，2000年6月魏老溘然长逝，使得这本回忆录只停留在他1936年参加革命至1950年的战斗经历，短短14年，却是戎马倥偬，出生入死。

近日，我们有幸联系到魏钦公的家人，他的夫人刘平也是老一辈革命者，如今已83岁高龄，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她激动地给我们回忆了魏老的一生。

“他在光山县当县委书记时，我在信阳地委工作。当时光山县的‘小保队’（编者注：指大别山区土匪、地痞、流氓及恶霸组织等的统称）势力特别猖獗，他们白天插枪转山头，晚上扛枪吓唬老百姓，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都遭受了他们的迫害，我们的部队主要是与当地的地主、恶霸组成的‘小保队’打游击战。”刘平老人向我们介绍了魏钦公在光山县的一些工作情况。

“他是一个严肃、安静、不慕名利的人。工作、生活严谨，从不多说一句话。每天晚饭之后就在书房看书。”刘平老人指着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柜说，你们看看柜子里的书，都是成套的，几乎每一套都会用掉他一个月的工资。

魏钦公出生在山东省单县曹庄乡魏刘庄的一个佃户家庭里，他自小接受教育后，领悟了很多进步的思想。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后担任中共单县城关区委书记、单县县委

《战斗报》总编辑、《团结日报》社总编等，他运用报纸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民众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对苏鲁豫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47年，中共中央决定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大别山，旨在占领大别山，切断国民党军津浦、平汉和陇海三条交通线，还能东慑南京、西逼武汉、钳制中原，直接威胁敌人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统治，迫使敌人的主力从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格局。

“这就算离开湖西（编者注：旧地名，辖单县城关区）了吗？脚步度量着熟悉的村庄、熟悉的道路。对湖西，我有着无限的留恋，但到新地区去是工作的需要和党的决定，群众和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魏钦公1947年7月12日记《离湖西》）。1947年，魏钦公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

1948年2月，魏钦公被任命为光山县委书记兼县武装（称光罗支队）政委。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积极工作，宣传发动群众，带领光罗支队在县境内开展武装斗争，狠狠打击敌人的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政权。同时，为巩固人民政权，他深入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全国各地的胜利形势，激起了许多革命老区人民的抗战热情。

1950年6月，魏钦公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党校，先后任党校教导主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党校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是河南省委党校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热衷于政治、哲学、党的建设、领导科学等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出版有《反对个人主义》《谈党的三大作风建设》等著作，主编出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哲学与社会实践》《光辉的哲学篇章》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魏钦公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死里逃生，经历了解放战争的风餐露宿，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始终如一。

“记得爷爷退休的时候，我才刚刚十来岁，还在上小学。最深的记忆就是每次周末回爷爷家时，总能看见他坐在这张书桌前看书，或是在写他的回忆录、整理他的文集，一直保持着工作状态。偶尔会在周末的下午带我出去逛逛公园，但很少给我买东西。当时我不理解，因为别的小朋友经常收到爷爷奶奶送的礼物，而我却很少，心里觉得爷爷很抠门儿，现在知道了，那不是抠门儿，而是节俭。”魏钦公的孙子魏展这样回忆爷爷。

“过去打仗，在山上，问题比较简单，现在管理全中国，问题就复杂多了。建设一个新世界比打碎一个旧世界艰巨得多。”（魏钦公，1985年，《要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在《魏钦公文集》里面，他阐述了很多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如《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加强作风修养》《关于领导科学》等文章，都很值得当今党员干部好好学习。

还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提的是，魏钦公在党校工作期间，作了许多实地调查报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篇章——农村调查随笔》《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光辉——刘庄调查》《关于小康建设的调查》等报告为河南省的农村改革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摘自2011年6月20日《中国县域经济报》，作者为王仲斌）



我的爷爷任弼时和奶奶陈琮英

□ 任继宁

20世纪90年代，经常有位头戴崭新的红军八角帽的老红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她那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那生活朴素、内心充实的革命老红军的亲切形象，深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她就是爷爷任弼时的终身革命伴侣、战友——我亲爱的奶奶陈琮英。

当年，我的曾祖父任裕道为了纪念自己深爱却不幸病逝的原配妻子陈氏，他按照当地习俗，为爷爷指定了娃娃亲，对象就是他岳父家的侄女后来成为我奶奶的陈琮英。曾祖父的“指腹为婚”，使奶奶不仅成为爷爷的终身伴侣，并让她的一生和爷爷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爷爷英年早逝，而奶奶在党组织、战友和亲人们的精心照料下得以高寿。她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参加全国政协、全国妇联活动和红军纪念活动，她于2003年去世时，享年102岁。奶奶的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幸福，也使她成为我青少年时期除父母以外最熟悉的亲人。

由于奶奶长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长征时期和革命成功后又一直负责党的机要密码工作。所以，她从不讲自己的光荣历史，她对革命的贡献甚至对我这个她视为掌上明珠的孙儿也极少提及。我能记起的就是她讲过的一段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战士跌入沼泽之中越陷越深。为了不连累其他同志，他连连向救援的同志摆手，示意他们不要过来，以免也落入沼泽。从奶奶几次回忆这件事中，我深深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难岁月。

我还有印象的是奶奶给我讲到过赵一曼烈士。赵一曼是奶奶八哥陈达邦的爱人，也是奶奶的嫂子。

当奶奶提到她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那时我们在上海为革命做地下工作时，曾经见到过赵一曼两次。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奶奶

是党的机要交通员。虽然她们都认识对方，但出于工作需要和严格的纪律，彼此只是用目光致意，并没有交谈。后来，赵一曼被伪满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成为东北抗联的无数英烈中抗日女英雄的代表。

奶奶是一位意志顽强、对党忠心、对爷爷忠贞的老一代革命家。她从小就辛勤劳作，用自己在织袜厂挣来的微薄工钱，接济爷爷读完中学；在白色恐怖之下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保障党对革命运动的指挥和联络；爷爷两次在白区被捕入狱，奶奶奋不顾身出面营救；她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机智勇敢，保护了党的秘密，经受了生死考验。

无论是西征还是长征中，奶奶都承担机要重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障着机要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34年西征的艰苦行军中，红六军团电台的队长阎知非，背着机器，行走非常困难。爷爷任弼时见了，让通信员把马牵来给他骑。这时，身上带着机要密码本的奶奶却掉了队，赤着脚倚在树下喘息。幸好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的陈罗英发现后，连背带拖地把她带走，这才赶上了军团部。爷爷见了她们非常高兴，诙谐地说：“哎呀！真要感谢你呀！我丢得起老婆，却丢不起机要局长哟！”因为保护党的机密有功，奶奶受到了表扬。可以说，奶奶是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而这位无名英雄的亲情也使我终生难忘……

自从我记事时起，奶奶就对我疼爱有加、关怀备至。她总是尽量让我吃好、穿好、生活好。她知道我喜欢喝凉白开水，就找个玻璃瓶子专门盛凉开水，别人都不许用这个瓶子加的水。晚上睡觉时，我常会把被子踢开。她常常起来定时检查我是否盖好了被子，免得我受冷着凉。

当我长大以后，奶奶仍然不舍得我离开左右。为此，她还经组织

同意，在客厅后面建了一间小房子，取名“小屋”，供我学习、生活。“小屋”离奶奶卧室很近，所以，她还是照样起来查看我的被子是否盖得严实，窗户是否关好。小时候，我喜欢吃大葱炒肉。奶奶就经常让厨房做大葱炒肉，让我吃得高兴。那时奶奶对我的疼爱，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艰苦朴素始终是奶奶做人的基本原则。我记得在她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就有毛泽东写的“艰苦朴素”4个大字的大幅照片。奶奶有个棕色硬纸针线盒给我的印象很深。里面有针线、扣子、小剪刀等，衣服破了她就拿出这个小盒子将破的地方补好再穿。这个针线盒实际上是从红军长征中使用的针线包演变而来的。她非常珍惜一针一线，说任何东西都来之不易，不能随便丢掉，要物有所用。她的衣物大多有补丁。

奶奶在生活中非常勤俭节约。她从医院看病回来以后，总是把包中药的纸绳、口袋、小药瓶都一一收好，以备以后使用。即使对每张包装纸、每份报纸、每根线绳，奶奶都分类放好，以便查找和再利用。我小时候还穿过她亲手补过的短大衣，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温暖、温馨。奶奶的伙食总是按照她的要求，准备得非常简单。每天下午3点左右，她都会吃一块小小的甜饼，作为她的下午加餐。奶奶引以自豪的还有使用公筷。她说，我们家在中南海中使用公筷的好习惯，是受过周恩来总理表扬的。

奶奶的严以律己也使我难以忘怀。她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作出了贡献。但当组织上准备评定级别时，她却一再坚持说自己没做什么，把高的级别让给别的同志。组织上配给奶奶的公务车，她也尽量不用，而且一再规定不许家属乘坐公务车。

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在他的精心筹划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转入战略进攻，他在年底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郑重宣布“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仅仅两年后，毛泽东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这教育我们，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赢得人民信任和支持，我们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是时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强调的观点。他指出：“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不同于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还号召司法工作人员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所进行的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

在绥德工作期间，习仲勋经常用“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来告诫机关工作人员。他在司法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要求党的各级干部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

从奶奶讲的故事里，我们得知了爷爷“三怕”：“一怕”麻烦人。爷爷认为能自己做的工作一定要自己做，不要去麻烦别人。“二怕”花钱多。爷爷在党的工作上每花一分钱，都斤斤计较，尽量利用有限的财力物力，为我党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三怕”工作少。爷爷一生总是不断地忘我工作，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被党内同志形象地称为“党的骆驼”，叶剑英称誉这种忘我的革命精神为“骆驼精神”。而这“三怕”，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熟知。

我出生那年，奶奶因为任家有传人了，高兴得不得了。为了让我继承任家的光荣传统，奶奶亲自给我起了名字——任继宁。“继”是继承，“宁”则是爷爷在大革命初期化名“陈宁”中的“宁”字，很可能是奶奶联想到爷爷早期在苏联时见过列宁。就这样，自我出生以后，我就和爷爷连在了一起。我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我知道，我的成长是和他紧密不可分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根据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我现在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挂职锻炼担任区长助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下基层、接地气，让我们更加体会到肩上的责任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谆谆嘱托，让我们为了美好的未来，更加努力地为人民和人民做好各项工作，让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世代相传。

（摘自2014年第7期《党史文苑》）



的问题。在这方面，习仲勋以身作则，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利。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习仲勋极力提倡因地制宜，大办冬学，仅1943年全区就办起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70715人。他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冬学工作的经验，强调“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得好”。这一经验经《解放日报》的推广，对全边区教育工作特别是开展冬学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要求我们做工作必须考虑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为民造福的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